

■ 广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丛书

■ 杨万秀 著

■ 广州出版社

中外历史的 探索借鉴



“广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划为序)

主任 朱小丹
副主任 李权时 周素勤
编委 马余胜 王 锐 叶汝贤
丘传英 朱小丹 华同旭
刘小钢 楊万秀 李权时
李江涛 李明华 周素勤
蔡 禾 黎小江



学问之道，贵在创新。博学专精，多思
善辨，持之以恒，必有所成。

——题记

253/24

总序

朱小丹

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辑出版的《广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丛书》，收入广州市优秀社科专家和优秀中青年社科工作者的个人文集，旨在展示和宣传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社科界的优秀人才和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优秀成果，调动广大社科工作者的积极性，推动和繁荣广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它不仅纪录了广州社科工作者不断攀登高峰的足印，也展现了广州社科研究事业不断发展的新趋势。

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入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江泽民同志也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这些论述十分明确地阐明了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不仅包括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基础理论，如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也包括多门应用科学，如市场经济理论、城市管理理论、社会保障理论、科技发展理论等。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

和教育，才能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科学的作用，将哲学社会科学与当代最新的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变成改造现实世界的巨大力量，促进我市现代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要使社会科学成为改造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就要坚持社会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实践服务的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广州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始终围绕广州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伟大实践展开，把应用、决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现实问题研究与历史问题，经济问题研究与社科其他领域的研究，宏观问题研究与中微观问题研究结合起来，使广州市社科研究整体水平得到提高，为广州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推动广州市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

我们的社科研究要以精品为龙头。为出精品，就要密切联系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中敢于提出独到的理论创见；就要满腔热情地概括总结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实践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就要大胆吸收借鉴国内外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力求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有新的突破。只有这样，才能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从而使社科研究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广州市的社科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生产出了一批社科研究精品，但是在本丛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也感到广州市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精品还不多，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有待提高。我们编辑这套社科优秀成果丛书，将为展示社科研究精品提供一个新的园地，以进一步促进广州市社科研究精品的生产。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本指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指导和推动下，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紧密联系广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力加强应用、决策研究，理论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新的发展，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合作日益活跃，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社科队伍不断壮大，科研经费逐年增长，为繁荣和发展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推动广州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这套社科优秀成果丛书编辑出版的就是这众多成就中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发挥其积极作用，推动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向更加务实、更加活跃、更加繁荣的目标发展。

目 录

中国近代史开端与华侨.....	(1)
从辛亥革命看华侨的爱国精神	(16)
清代缅甸华侨	(30)
十九世纪下半叶华侨在北圻的贡献	(4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	(61)
孙中山的华侨观与华侨华人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67)	
关于《越法凡尔赛条约》的问题	(79)
近代中越关系的几个问题	(87)
二十世纪初中越关系的几个问题.....	(100)
广州人民对越南革命的支持和帮助	(113)
黑旗军在越南的抗法斗争.....	(128)
刘永福对中越友好关系的贡献.....	(142)
刘永福入越抗法的几个问题.....	(154)
关于刘永福评价的两个问题	(171)
试论刘永福晚年在广州的反帝爱国活动	(185)
抗法名将冯子材	(207)
孙中山与越南	(222)

孙中山对越南革命的影响和帮助	(245)
孙中山对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	(254)
广州历史的特点	(265)
研究广州外贸史的重要意义	(269)
广州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	(272)
广州名人与广州社会发展	(284)
凌十八起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292)
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与广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302)

中国近代史开端与华侨

1840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资本主义列强多次的侵略战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无穷的苦难，独立的封建的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华侨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必然影响到华侨历史的发展。无论华侨出国的原因和规模，或是在国外的地位和遭遇，乃至他们的思想观念，与近代以前比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一、出国的原因和规模

我国人民侨居国外者自古有之。但唐宋以前为数很少。唐宋开始，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海外交通和贸易的繁荣，我国人民在海外侨居逐渐增多。特别是明清两朝更替之际，因战乱有较多的人逃往邻国居留。总括起来，至鸦片战争前，我国人民侨居国外的原因主要有四：（一）经商需要。明

朝以前，我国历代政府基本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除了政府间的朝贡贸易之外，还有私人的海外贸易。商人为了推销商品或收购当地产品，往往需要在国外较长时间居留。商人中多数是青壮年男子，为了经商的需要，他们中一些人与当地妇女结婚成家。明清两朝虽然实行海禁，由国家垄断海外贸易，禁止私人下海。但实际上却是禁而不止，沿海人民私人从事外贸者大有人在。朝廷对他们采取敌视政策，把他们视为自弃王化的“莠民”，对归国者严行惩处，迫使他们不得不流寓海外。（二）新旧王朝更替时，前朝臣民不愿臣服新王朝的统治，避居国外。如朱舜水流寓日本，还到过暹罗、安南等地。杨彦迪、陈上川流亡安南，“率兵三千余人”。莫玖南投真腊，由真腊王安排开发河仙地区，此处后来成为安南的一个重要港口。（三）因国内战争或政治动乱而居留国外。明朝末年，桂王朱由榔的官兵和眷属，有的流亡泰国，有的散落缅甸。后来缅甸境内的“桂家”和“敏家”就是桂王官兵的后人。（四）残酷的封建剥削，一些人生活没有出路，不得不铤而走险，出洋谋生。除此之外，元朝和清朝对外战争的过程中，也有少数人散落在国外。

以上情况表明，鸦片战争前，我国人民侨居海外还带有偶然性、局部性和规模小的特点。侨居地区主要是邻近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这种特点，是与我国当时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相联系的。

鸦片战争后，我国人民出国的原因、历史背景和出国的规模，与以前相比，有了根本的变化。“对华战争给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国家的闭关自守已不可能。……于是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也随之而日益瓦解（在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中，农家自己制造必要的工业品），同时，可以安插比较稠密的人口的那一切陈旧的社会制度，亦随之而崩溃。千百万人将无事

可做，将不得不移往国外”。^①恩格斯这一非常深刻地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鸦片战争后出现华侨出国高潮的根本原因。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为了推销产品和掠夺原料，它们迅速地、大规模地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腐朽的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于1842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除了割地赔款之外，还开放五口通商。其他列强也步英国的后尘，通过战争或其他手段，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了种种特权，开放更多的港口城市。这样，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一）沿海地区大批农民失去了土地。清代后期，农民所受的剥削已经很重。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又将战争的费用和赔款强加在他们身上。农民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促使农村的土地更高度地集中到极少数的地主手中，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和福建的沿海地区）的多数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生活手段。（二）小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五口（后来逐渐增加）通商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像潮水般地涌入我国城乡，特别是沿海一带。我国传统的手工业产品无法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生产品竞争，小手工业者纷纷破产。19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大肆地向外输出资本和倾销商品，我国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农民失去土地和手工业者破产，使我国封建社会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基础受到破坏。本来是地少人多的沿海地区，出现了大批的无业劳动者。这种“过剩”的劳动力，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使

^① 恩格斯：《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7页。

我国人民陷入极度贫困的结果。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我国民族资本的企业才开始出现，而且发展缓慢，不能吸收众多的“过剩”劳动力。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不得不离乡背井，出洋谋生。

还必须指出的是，鸦片战争后，我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加深。19 世纪中叶，爆发了我国近代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受其影响的范围广泛的天地会起义。起义失败后，为了逃避清朝政府的捕杀，大批的起义农民和他们的眷属，也逃居国外。

到 19 世纪中，东南亚地区已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为其所控制。在此之前，美洲和澳洲也早是殖民者的天地。为了尽力地掠取这些地区的资源，殖民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矿业和建筑业。而鸦片战争后，列强迫使清朝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他们掠取我国劳动人民大开了方便之门。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北京条约》，清朝政府被迫承认允许中国人赴英法殖民地或外洋其他地方做工。这实际上是明令废除海禁政策。禁海令的废除，为沿海人民出国敞开了大门。1866 年，英法与清朝政府签订招工章程条约，允许英法任意在中国招募劳工。1868 年，清朝政府又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又称《蒲安臣条约》。该条约规定，两国人民来往或居住“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从而使美国在中国掠夺劳动力合法化。这些不平等条约，成为列强掠夺中国劳动力的护身符。

中华帝国的大门被打开以后，出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华侨出国高潮。这一时期华侨出国高潮形成，或者说华侨出国的主要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资本主义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结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移民已卷入了世界

资本主义发展的浪潮。资本主义向外扩张需要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促使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沿海地区出现了大批无业的劳动大军，为殖民主义者获取这种特殊商品提供了可能性。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外扩张具有全球性，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我国向海外移民的必然性、长期性、规模大和遍布世界各地等特点。从 19 世纪中至 20 世纪中 100 年左右的时间，我国人民（主要是广东和福建两省）移居世界各地的人数，向来没有详细具体的统计。据薛福成 1890 年《出使英法义比日记》，当时东南亚的华侨约有 300 万人。加上当时美洲和澳洲有几十万人，其他地区几十万人，总计约有 400 万人。到 20 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华侨的人数又有了很大的增长，大约有 800 万人至 1000 万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估计为 2000 万人。这些华侨除多数在东南亚国家外，还遍布美洲、澳洲和非洲等地。

二、在国外的地位和遭遇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封建大国，经济文化发达，在长时期内处于世界的先进地位。这一时期华侨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无论是“汉人”、“唐人”和“明乡人”都受到各国人民的尊重。元代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记载：真腊国“往往土人最朴，见唐人颇加敬畏，呼之为佛”。^① 总的来说，鸦片战争前，华侨在侨居国的正当权益受到保障，与侨居国人民友好相处。只是西方殖民者到来以后，

^① [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贸易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影印本。

才出现了一些歧视、排斥，乃至杀害华侨的事件。1740年印度尼西亚境内发生的大批屠杀华侨的红溪事件，就是荷兰殖民者所为。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经济文化落后了，大小列强和帝国主义都侵略中国，欺侮中国人民。华侨在国外也没有地位，遭受各种歧视和排斥。腐朽的清朝政府也无力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

鸦片战争后，华侨出国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契约华工”；一种是“自由”出洋。

所谓“契约华工”，也叫“猪仔”华工，或谓“苦力”。这是鸦片战争后华侨出国最主要的形式。外国资本家或华人工头（经纪人），与沿海失业的劳动者订立“契约”，把他们贩卖到世界各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契约”规定华工在一定的时间内靠工资收入还清旅费和其他欠款（如有的国家收人头税）后，才能“自由”寻找工作。“赎单工”是“契约华工”的变种，出洋的人向殖民者或华人包工头赎欠旅费。为偿还这些旅费，他们到外洋后必须先无偿地做工抵债，才能获得人身自由。无论是“契约华工”或“赎单工”，遭遇都非常悲惨。从签约开始，华工就失去了自由，实际上已沦为会说话的工具。西方列强公开挂出“招工所”、“招工局”的招牌，运输华工的船停泊在厦门、汕头、广州、海口、香港和澳门等沿海港口。船上的卫生条件和生活条件极差，华工像牲口一样被关在舱底，环境污秽，受饿挨冻，疾病蔓延，经过长时间的旅程，大批华工在途中死去，而幸存者面临的也是血泪的前程。以古巴为例，从1847年到1874年的27年中，运到古巴的华工约计为143000人，但真正到达古巴的只有126000人，途中被折磨死

者有 17000 多人。^① 华工遭受种种的酷刑和虐待，造成华工大批死亡。在东南亚地区，英属马来亚是“契约华工”高度集中的地区之一。这里华工死亡率最高每年达 20%，比同一时期当地居民的死亡率高 7 倍，比当地欧洲人的死亡率高 23—30 倍。^② 以美国来说，华工的死亡率也是很高的。参加修筑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华工约 4 万余，筑路而死亡的也有 1 万人。^③

“契约华工”经若干年的苦力劳动，偿清债务后，才能“自由”寻找工作。他们的职业多数是开餐馆、开洗衣店，经营小商小贩，也有的继续佣工，以微薄的收入艰难地维持生活。

所谓“自由”出洋，是我国传统的出国形式。随着海外交通和贸易发展，我国沿海人民早有出国经商和做工的历史。鸦片战争后出国谋生的人更多。这些人多数是在国内生计无着的劳动者，他们有的投亲靠友，有的独自经营，日子都过得非常艰难。

无论是“契约华工”，或是“自由”出洋的华侨，在国外都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他们从事最辛苦、最不卫生和最危险的工作，得到最低的工资，还遭受严重的国籍歧视和种族歧视。他们“地位等于奴隶，工资比本地人少一半，纳税比任何人多”。^④ 当殖民主义者和侨居国的统治者因开发当地经济，需要劳动力的时候，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拐骗和掠卖中国人民；

^① 郭梁：《华侨出国史述略》，见郑民、梁初鸿编《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一），海洋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27 页。

^② 郭威白：《马来西亚中国人在发展当地经济中的地位》，见《中山大学学报》1959 年第 4 期，第 83 页。

^③ 朱杰勤：《19 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及处境》，见梁初鸿、郑民编《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二），海洋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7 页、第 141 页。

^④ 《志刚日记》，见〔清〕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 10 册，上海著易堂清光绪十七年版。

当劳动力“过剩”，他们认为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或为了某种目的的时候，就采取种种措施，歧视、限制和排斥华侨，甚至残酷无情地驱赶和杀害华侨，出现反华排华事件。

各国华侨遭受歧视和排斥的情况有所不同。以美国为例，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因开采黄金、修筑铁路和开发西部地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大批廉价的中国劳动人民，进入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到1880年，美国华侨已达10万人以上。即使在美国这样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华侨也遭受明显的歧视。以参加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华工工资而言，中国工人一般是每月30元，还得自己负责食宿费。白种工人每月45—50元，而且由公司负担他们的食宿费。即超过中国工人工资一倍以上。^①而且，美国当局还订下一些苛例，歧视和盘剥华工。1853年5月4日，美国加州当局通过了一个法案，凡在金矿和石英矿工作的外国人每月要纳执照税3元，次年又增加到4元。当局解释这个法案，凡不是美国公民或不声明愿加入美国籍者，适用此法案。而所有外国人中，只有中国人无权声明入美国籍。实际上，这个条例是专门针对华工而设。^②随着美国华侨人数的增加，美国排斥和限制华侨的舆论逐渐兴起，而且形成国家的立法，由政府实行。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停止华工入美。对已在美国的华侨也实行种种的限制和打击。从此美国境内连续发生排斥和迫害华侨的事件。1885年9月，洛杉矶发生排华事件，华人被杀28人，重伤15

^① 朱杰勤：《19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及处境》，见梁初鸿、郑民编《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二），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第141页。

^② 朱杰勤：《19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及处境》，见梁初鸿、郑民编《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二），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第141页。

人，财产损失约值美金 15 万元。1900 年，在檀香山，美国借检疫，放火烧毁唐人街，不仅华侨财产损失 260 万元，而且死伤许多人。美国 1882 年的“排华法案”后来进行了多次增修。1904 年 4 月 27 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过去所有排华法令永远有效，对中国人的入境和在美的华人实行限制。他们把中国人视为有色人种，实行种族压迫，甚至进行人身攻击，阻止中国人加入美国国籍。直到 1943 年，美国才废除了“排华法案”，实行侨民的“国籍配额制”。1965 年以后，美国又进一步修改移民政策，华人的历史才开始了新的一页。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等国华侨的遭遇，也大体上与美国相似。

东南亚地区是我国的近邻，华侨的人数最多。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先后统治和控制了东南亚国家。殖民者为了掠夺这里的资源，大量地开采矿山和开辟种植园，除了需要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之外，还需要华侨帮他们经营。同时，他们又害怕华侨势力的发展影响他们的殖民统治。对华侨和当地人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法，挑拨离间，制订一些歧视性的政策，限制和打击华侨。首先，殖民者认为华侨有什么“越轨”行为，或认为对他们的统治不利，就将华侨逮捕或驱逐出境。其次，殖民者对华侨征税特重，而且有许多歧视的规定。在印度支那，法国殖民者，“其征诸华人之税最苛，名目计有六项，曰进口，曰出口，曰身，曰屋，曰地，曰招牌。查身税一项，人岁七元，每岁合征二百八十余万元”。其中进口税和身税，欧、美、日人全免，只向华侨征收。^① 此外，殖民者还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离间华侨与当地人民的友好关系，挑动当地人排斥华侨。

^① 袁祖志：《瀛海采访纪实》，见〔清〕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 11 册（2），上海著易堂清光绪十七年版，第 453 页。